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甘肃肉牛产业发展浅析

张邦林¹, 贺春贵², 王建连¹

(1.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70; 2.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对甘肃省肉牛产业布局、规模、生产能力、良种繁育等现状进行了总结梳理, 找出当前肉牛产业存在产业化发展水平不高、产品质量安全形势严峻、饲草资源保障能力脆弱、养殖环境保护压力增大等问题。从供给侧改革视角探讨提出了优化产业结构, 提升产品效益; 强化标准引领, 确保产品质量安全; 有效利用资源, 维护草原生态可持续性; 推行科学养殖, 确保环境友好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 甘肃肉牛; 结构调整; 提质增效; 生态环保; 措施

中图分类号: S8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1463(2019)07-0077-06

doi: 10.3969/j.issn.1001-1463.2019.07.018

甘肃是全国六大牧区之一, 肉牛产业是甘肃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甘肃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助推畜牧业发展, 畜牧业在农业中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大, 肉牛产业的家庭副业地位也随之彻底改变。然而,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消费理念、消费结构、消费方式发生变化, 生活需

求逐步提高, 对优质、安全、环保、营养、健康, 以及多样化、高端化畜产品的消费需求与日俱增, 甘肃肉牛生产中中低端一般性产品过剩、高精端产品稀缺等供给侧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因此, 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通过供给侧改革, 形成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

收稿日期: 2019-05-16

基金项目: 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甘肃省肉牛全产业链生态循环经济模式研究”(14YB132);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创新专项“甘肃肉牛产业链研究”(2013GAAS30)部分内容。

作者简介: 张邦林(1972—), 男, 甘肃靖远人, 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研究工作。联系电话: (0)13919800844。

执笔人: 王建连。

龙头企业合作开展园区建设, 建设食用菌扶贫车间, 破解企业融资难题, 实现投资方、承接方、经营者三方共赢发展。

参考文献:

- [1] 魏生龙, 张汉燧, 梁倩倩, 等. 张掖市食用菌产业发展模式研究[J]. 河西学院学报, 2016, 32(5): 1-10.
- [2] 张天云. 张掖市食用菌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J]. 科技创新与应用, 2015(33): 293.
- [3] 路等学, 王 龙, 秦 杰. 甘肃省食用菌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09(3): 29-33.

- [4] 许宏林, 王学文. 甘肃张掖市食用菌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J]. 中国园艺文摘, 2014(10): 77-79; 117.
- [5] 李文德, 张文斌, 李建华, 等. 张掖市食用菌产业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J]. 北方园艺, 2014(20): 177-179.
- [6] 马丽君, 张文斌, 王俊梅, 等. 张掖市双孢菇产业发展浅议[J]. 甘肃农业科技, 2013(1): 56-57.

(本文责编: 陈 珩)

约、环境友好的供给体系, 打造养殖环境优美、周边水土净美、畜产品味美的新型畜牧业, 是甘肃肉牛产业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1 肉牛产业现状

1.1 产业布局趋于优化

在牛羊产业大县建设及现代畜牧业试点项目的扶持、带动下, 陇东、河西肉牛产业带已初步形成, 年出栏肉牛 110 万头左右, 占全省的 62%; 甘州、泾川、崆峒、凉州、灵台、碌曲、玛曲、宁县、夏河 9 县(区)被列入全国肉牛优势区域。据统计(表1), 20 个牛产业大县 2014 年牛存栏 301.33 万头、出栏 128.25 万头, 分别占全省牛存、出栏的 57.72%和 69.28%; 牛肉产量为 126 558 t,

占全省牛肉产量的 65.44%。2015 年牛存栏 297.27 万头、出栏 132.30 万头, 分别占全省牛存栏、出栏的 57.44%和 68.64%; 牛肉产量为 132 006 t, 占全省牛肉产量的 62.44%。肃州、崆峒、泾川、崇信、华亭、灵台、宁县、清水等县(区)牛出栏率均在 50%以上, 玛曲、凉州、崆峒、甘州 4 县(区)2014 年、2015 年牛出栏量均超过 10 万头、牛肉产量均超过 10 000 t。

1.2 规模化程度明显提高

合理有效的政策支持、项目引导及效益驱动, 极大促进了肉牛标准化、规模化、设施化的生产进程。2014 年, 甘肃省新建各种规模养殖场(合作社)814 个, 创建部级标

表1 2010—2015年甘肃肉牛规模养殖场(户)情况^①

区域	2014年			2015年			
	存栏量 /万头	出栏量 /万头	牛肉产量 /t	存栏量 /万头	出栏量 /万头	出栏率 ^② /%	牛肉产量 /t
玛曲县	49.69	15.49	13 168	48.45	16.16	32.52	13 737
凉州区	37.48	13.82	13 823	36.95	14.36	38.31	14 361
甘州区	29.29	11.25	12 379	29.19	11.63	39.71	12 792
碌曲县	19.57	4.34	3 601	19.40	4.54	23.20	4 543
崆峒区	17.37	12.63	12 633	17.29	13.48	77.61	13 481
夏河县	15.07	6.83	5 601	13.85	7.18	47.64	5 884
高台县	13.07	3.70	3 705	13.01	3.80	29.07	3 801
临泽县	12.35	5.61	5 605	12.27	5.78	46.80	5 783
张家川县	12.06	3.82	3 815	11.99	4.03	33.42	4 025
灵台县	11.60	6.50	6 502	11.66	6.58	56.72	6 584
华亭县	11.43	6.48	6 477	11.36	6.94	60.72	6 942
泾川县	10.62	7.68	7 680	10.38	7.58	71.37	7 582
肃州区	10.16	8.26	8 260	10.11	8.69	85.53	8 688
岷县	9.50	1.39	1 392	9.41	1.45	15.26	1 454
宁县	9.37	4.91	5 887	9.32	5.13	54.75	6 152
礼县	7.71	2.66	2 655	7.70	2.77	35.93	2 767
清水县	6.71	3.55	3 553	6.69	3.59	53.50	3 588
崇信县	6.65	4.97	4 974	6.63	4.08	61.35	4 796
徽县	6.01	1.92	1 917	6.04	1.96	32.61	1 964
康乐县	5.62	2.44	2 931	5.57	2.57	45.73	3 082
全省	522.02	185.12	193 400	517.53	192.75	36.92	211 400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畜牧兽医年鉴》(2010—2016年), ②出栏率=(本年出栏量/上年末存栏量)×100%。

表2 甘肃省20个肉牛产业大县(2014年、2015年)牛生产情况(按牛年末存栏量由高到低排序)^①

规模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年出栏1~9头	482 614	513 408	491 205	524 297	485 503	481 006
年出栏10~49头	17 802	18 299	14 016	16 879	13 926	14 259
年出栏50~99头	2 611	2 817	2 344	5 492	2 295	2 399
年出栏100~499头	794	863	972	1 063	1 038	1 063
年出栏500~999头	98	131	146	181	185	196
年出栏1000头及以上	25	34	42	60	65	70

① 数据来源于《甘肃发展年鉴》(2015年、2016年)。

标准化示范场 7 个, 省级示范场 87 个; 有 3 个单体项目投资金额在 10 亿元以上, 30 余家个体工商户投资金额上亿元。在现代畜牧业全产业链试点项目带动下, 张掖市新建 10 万头肉牛屠宰分割生产线 1 条, 临夏州升级改造年屠宰 10 万头肉牛生产线 1 条。全省肉牛年出栏 100 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场(户)达 1 288 个, 其中年出栏 1 000 头及以上的有 65 个, 规模养殖比重达到 41.5%。2015 年, 全省肉牛规模养殖比重达 45%, 年出栏 100 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场(户)达 1 329 个, 其中年出栏 1 000 头及以上的有 70 个, 较 2010 年增加 180 百分点(表2)。

1.3 生产能力有效提升

近年来, 甘肃省各级农牧部门立足全省“三农”实际, 以促增收、保供给为工作重

点, 以牛羊产业大县建设和现代畜牧业示范点建设为抓手, 全力推进现代畜牧业建设, 以牛羊为主的草食畜牧业保持了稳定增长态势。据统计, 2010—2015 年, 甘肃肉牛年末存栏量在部分年份有波动, 总体呈增长趋势, 2015 年度较 2010 年度增加 16.4 万头; 牛肉产量由 2010 年的 16.1 万 t 上升为 2015 年的 18.8 万 t, 每年增速 0.56 万 t, 总量增加 2.7 万 t(图 1)。

1.4 良种繁育体系逐步建立

在国家畜牧良种补贴等项目的支持下, 种牛资源逐渐丰富, 以冻精生产、液氮站、改良站、冻配点为主的良种繁育体系逐步建立; 杂种牛群体和商品肉牛杂交生产体系已基本形成; 开展了早胜牛、甘南牦牛等优良地方牛品种资源的保护行动; 实施“河西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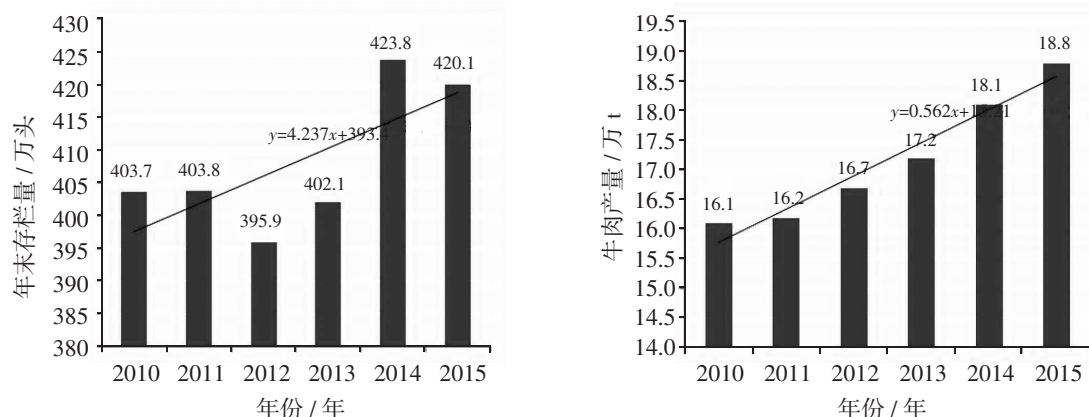


图 1 2010—2015 年甘肃肉牛年末存栏量和牛肉产量情况 (数据来源:2011—2016 年《中国畜牧兽医年鉴》, 图 2 同)

牛”、“陇东肉牛”新品种(系)选育等工作,组建了“河西肉牛”、“陇东红牛”核心群。种肉牛场能繁母畜存栏量、当年出场种畜数量均呈增长态势(图2)。

2 肉牛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 产业化发展水平不高

目前,甘肃省现代畜牧业转型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型肉牛生产加工企业数量较少,具有一定规模和带动效应的龙头企业更少。现有的龙头企业普遍规模小、科技含量低、信息渠道窄,缺乏有效的运作模式和经验,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尽合理,肉牛产业标准化生产程度较低,产业链条短、辐射带动作用不强^[1]。虽然部分养殖生产企业在发展中形成了一些品牌,但因品种单一,安全性、优质化等与市场需求差距较大,高精端产品比重小,品牌效应和影响力不够,加之与终端消费市场的对接和合作不紧密,生产链条与消费链条不能准确对接,导致产品优质不优价^[2]。部分养殖龙头企业靠贷款起家,投融资渠道窄,负债重,产品精深加工水平低,生产加工产品单一,生产环节难以与市场有效对接,产品效益不高。

2.2 产品质量安全形势严峻

部分肉牛养殖区兽医卫生防疫设施缺乏,防疫制度不完善,养殖户对动物免疫

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开展防疫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强,疫病防控不规范,重大疫病时有发生,加之诊断技术较落后,疫病检测程度低,实现各类重大动物疫病全覆盖免疫的难度大。同时,有的肉牛生产企业及饲养者、经营者为获取最大利润,滥用或非法使用违禁药品的情况屡禁不止,加之私屠滥宰现象难以制止,产品质量安全难以保障。

2.3 饲草资源保障能力脆弱

近年来,在政策扶持及项目带动下,甘肃省草产业建设及饲草料资源利用成效明显。但长期以来,在草地利用过程中,重利用、轻保护、多索取、少投入的现象比较突出。由于超载过牧等掠夺式生产,造成草原生产能力严重透支,部分天然草地植被稀疏、水源涵养能力减弱,沙漠化、盐碱化加剧,毒草滋生、鼠害频发,草原生态恶化的趋势在短时期内难以改观。虽然人工种草面积及秸秆饲料化利用率在逐步提高,但对饲草及农作物秸秆收储、加工、饲料化利用的机械化水平低,与规模养殖需要还有差距,秸秆的收集储运成本较高,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饲料化技术综合利用程度低,压缩裹包、颗粒化加工等新技术应用不足,饲草种植与储运产业化程度较低,饲草料资源浪费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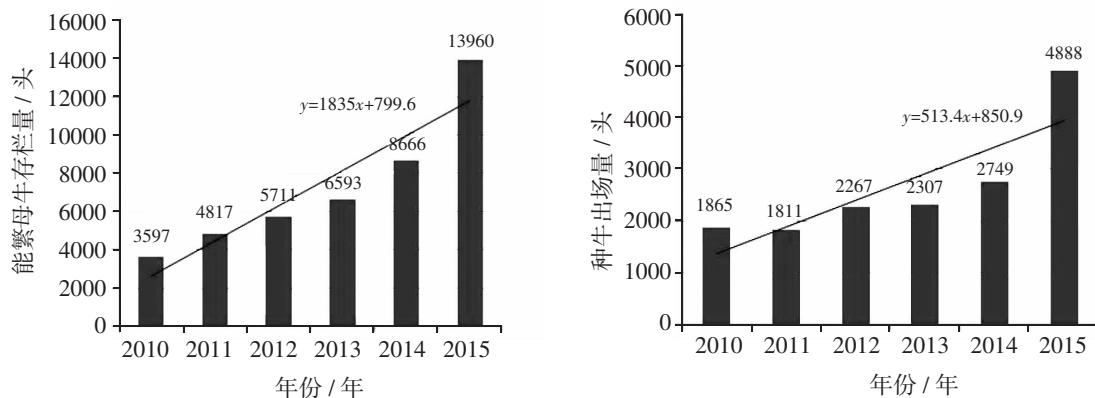


图2 2010—2015年能繁母畜存栏量、当年出场量

2.4 养殖环境保护压力增大

甘肃大部分农牧区基础设施落后,肉牛养殖小区布局不尽合理,饲草料加工、储备设施不完善,畜禽粪便、污水、恶臭等养殖废弃物处理设施不完备,饲舍距村庄、道路较近,人流、车流和物流频繁,环保隐患较大。部分养殖小区饲养管理不规范,养殖品种混乱,加之从事畜牧生产的农牧民文化程度相对较低,饲养方式比较落后,私屠滥宰现象时有发生,疫苗、药残、非法添加物等发生的几率较大,增加了污染土壤、水源、空气、社会环境的潜在风险。

3 供给侧视角下肉牛产业发展措施

3.1 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品效益

一是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以“粮改饲”为突破口,适度调整种植结构,优化土地资源配臵,发展青贮玉米和苜蓿等优质牧草,统筹种养配套协调发展,提升畜牧业发展空间,打造草牧业新支柱,促进种养效益双提升^[3]。

二是加快发展科技含量高、产业链条长、加工程度深、资源利用好、市场竞争强的牛肉精深加工龙头企业,引导鼓励龙头企业向优势区域内集聚,通过“公司+合作组织+养殖户”等订单农业模式,与养殖户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关系,落实产业化经营成果共享,推动产业化发展^[4]。

三是建立、完善产业预警机制,加强对产业趋势、市场信息、供求变化和成本效益的分析预测,促进产销衔接;积极引导肉牛养殖合作社、协会,养殖大户等以市场为导向,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拓展价值链,提高畜禽产品加工比重,提升加工档次,不断细分产品加工业向精深方向发展,提高产业链增值能力,促进产业提质增效。

四是提高流通水平,搭建“互联网+”,发展电商等新销售业态,保障产品新鲜程度,发展冷链物流。拓展完善加工流通全产

业链条,注重肉牛文化培育,推动产业跨界融合、相互渗透,提升价值链、提高附加值,打造三产融合发展新格局。

3.2 强化标准引领,确保产品质量安全

一是加快标准化示范创建进程,积极发展一批标准化程度高、示范带动作用突出、管理规范、效益显著的规模养殖企业、标准化养殖小区、适度规模养殖户,建立与国际市场接轨的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操作技术标准体系,并以此规范肉牛产业,逐步实现高水平的设施化养殖。从种畜源头抓起,构建企业和科研机构双赢的育种联结机制,建设肉牛育种平台,加快品种选育步伐,带动畜牧业提质转型升级。

二是立足于平凉红牛、河西肉牛等地理标志品种,做大地方特色产业。推行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营销,深入开展无公害、绿色、有机产品认证,培育知名品牌和驰名商标,形成品牌担保品质、优价激励优质的机制,以名优产品、著名品牌开拓国际国内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产品附加值和产业效益。

三是积极发挥科研院所和畜牧企业的技术优势,完善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体系、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建设,加大指导培训力度,有效解决养殖过程中疫病防治的突出问题。强化综合防控及疫情监测措施,加强种畜引进、购销等环节的疫病监测、检疫程序和措施,有效控制重大动物疫病的发生,保障畜牧业健康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

四是强化动物卫生监督 and 畜产品安全监管工作,严厉打击违禁使用药品和违规使用兽药、饲料添加剂等不法行为;加强生鲜乳、兽药、饲料质量安全管理,建立健全生产档案记录。全面构建畜产品监测监管网络,加强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逐步提高肉牛屠宰产业的准入门槛和产业集中度,规范生产,建立完善的质量追溯体系,以确保牛肉质量安全。

3.3 有效利用资源, 维护草原可持续性

一是充分发挥甘肃省自然资源优势, 在“粮改饲”的大背景下, 加快发展草食畜牧业, 做到宜草则草、宜饲则饲、宜牧则牧、宜粮则粮, 实现资源有效利用。推进优质牧草种植和天然草地改良, 积极开发林间草地、灌丛草地, 注重草畜配套、平衡; 降低饲料成本, 加强秸秆开发利用, 加快饲草料产业化发展。

二是立足甘肃草食畜牧业发展实际, 按照保护草原生态、转变发展方式、促进草畜平衡的基本工作思路, 研究制定“农牧互补, 增草减畜”的农牧互惠政策, 集中力量解决草原牧区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提高草原牧区生态文明水平, 提升草原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是鼓励农牧民、种草大户及相关企业整合土地资源, 实行集中连片规模种植牧草, 积极推进饲草料基地建设。积极引导农民经济合作组织、饲料企业等参与饲草饲料收储、加工, 支持大型养殖企业与农户之间建立订单生产模式, 推动牧草产业规模化、区域化发展。

四是扶持建设饲草料生产加工配送试点, 正确引导个人、企业、合作组织开展商品性饲草加工, 为农牧区提供质优价廉的饲草料, 切实保障草食畜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3.4 推行科学养殖, 确保环境友好

一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高品质、高效益”为主攻方向, 根据环境承载能力, 科学合理布局养殖区域、养殖品种和养殖规模, 探索建立高效实用的粪肥综合利用主导技术模式, 围绕圈舍设计、自动饲喂、环境调控、疾病防控等关键环节, 配套建设节水、清粪、有机肥生产加工等设施设备, 推进粗放落后的养殖方式向智能化转变, 实现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循环利用, 从源头预防养殖污染。

二是实施区域环境准入政策, 加强养殖

园区污染集中处理设施配套建设和运营管理, 实施重点养殖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和浓度控制。对于污染物排放超过排放标准或总量控制标准以及排放有毒、有害物质进入水体的, 实施清洁生产强制审核制度^[5]。

三是优先在生态涵养发展区和生态保护发展区推行草食家畜无公害集约化饲养技术, 把土壤消纳粪污承载力作为确定养殖规模的重要条件, 鼓励养殖场按照养殖数量流转相应比例的农田, 将种植业、养殖业有机结合, 形成一个完整的绿色生态产业链, 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6]。

四是充分利用荒山荒坡和农作物秸秆等资源, 以加快推进种养结合、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处理循环利用、畜牧投入品科学使用为主线, 注重培育专业畜禽粪污处理及资源化综合利用龙头企业, 面向中小畜禽养殖企业提供社会化服务, 促进畜禽粪便-农家肥的科学利用, 形成种养结合、农牧结合循环利用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 [1] 李积友. 基于甘肃省草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考[J]. 中国牛业科学, 2015, 41(1): 6-9.
- [2] 李含琳. 甘肃省草食畜牧业发展现状和对策探讨[J]. 甘肃农业, 2014(12): 3-4.
- [3] 王汝富, 曹明崇, 曹蕾, 等. 甘肃草食畜牧业发展饲草支撑和保障能力状况调研报告[J]. 甘肃畜牧兽医, 2014, 44(5): 76-79.
- [4] 张勇, 王辉. 对推进畜牧业供给侧改革实现绿色发展的思考[J]. 养殖与饲料, 2017(6): 111-112.
- [5] 张健, 蒋安, 黄德均. 草食牲畜全产业链重大问题及政策建议[J]. 草业与畜牧, 2016(4): 52-55.
- [6] 王晓武. “玉米-牛/羊-蚯蚓-鸡-肥”种养结合循环型绿色农业技术规范[J]. 甘肃农业科技, 2016(9): 61-64.

(本文责编: 杨杰)